

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上）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摘 要：2006年，作者进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工作，从此开启了继承学院华夏传播研究传统以及个人不断创新的学术之路。在过去的13年中，作者一方面发挥学科背景优势，开拓了老子传播学这一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配合学院的发展构想，闯进了海峡传播研究领域，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将二者汇入华夏传播研究，从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

关键词：华夏传播研究；华夏传播学；老子传播学；海峡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83(2019)05-0006-07

很荣幸受邀向读者朋友们讲述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虽然并不成熟，但也有一定特色。作为新闻传播教育战线上的新兵，我于2006年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仅有13载的光景。回望自己与华夏传播研究这一由前辈们开拓的领域结缘的历程，总有感恩之情在心头涌动，总感觉有经验要与同仁分享，我期盼华夏传播学得以构建，传播学“中华学派”能够确立，并走上与西方传播学相媲美的自觉发展道路。今日所谈，若能使我的同行、朋友以及未来即将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等学术研究的学者们从中获得一点点启示，也不枉我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秋季，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梳理我的学术探索之路了。

先从我的生活、为学和事业的信条说起吧！

我的生活信条是：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袁枚

生命是渺小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生命是个奋斗不息的过程，是个不断追寻意义的过程。正因为有了意义，生命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我深知自己学问尚浅，但却有着一颗不断向上的心，一颗向古人和今人，尤其是向前辈学者和同仁学习的谦逊的真心。学术大咖是我心中的牡丹，而我只是一朵小小的苔花，虽然微小，但我也要努力向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绽放自己的美丽与光芒！

我的为学信条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老子是我最崇敬的一位先哲，他的《道德经》是我25年来时常学习的经典之一，我的许多论著都是向老子致敬的产物。老子深邃的思想，我是深信之，笃行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名言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年青学者，我虽然拥有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教育背景，但我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主要是靠自学、靠前辈们的点拨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千里之行固然遥远，我也难说具备“才华横溢”的素质，但我相信，只要养成“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就终究能够到达千里之外的胜利彼岸。

我的事业信条是：

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谢清果

当我逐步踏上华夏文明传播研究这条奇妙之旅后，我确实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领域，并立志为之奋斗终身。我开展华夏文明传播研究的第一个信条，便是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研究的基础一定要扎根在中华大地上，而我自己，也一定要充当一枚推动传播学“中华学派”最终得以建立的铺路石，或者是一级供后人得以向上攀登的台阶，为中国传播学的崛起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当然，华夏传播学的建构也不能局限在中华文化圈内“自娱自乐”，她必须是在“全球传播视野”的帮助下，在中外思想的对话和砥砺中不断前行。对于外国的传播思想与传播理论我们不妨抱着“拿来主义”的心态，参考借鉴，为我所用。只要我们本着“以我为主，综

收稿日期：2019-09-24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华夏传播研究》《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主编。

合创新”的理念，在一代代学者的持续努力下，久久为功，相信华夏传播学一定能够心至功成。

接下来，我就谈一谈我的成长历程，与读者诸君共勉！众所周知，做研究大体上是从博士生阶段开始的，而参加工作往往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开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便有了安身立命的条件，工作作为研究的依托，会促使研究进入自觉的阶段。因此，本文先从自己博士毕业参加工作这个时间点谈起，今后如有机会再详细回溯有生以来的种种感悟，以期与读者诸君深入谈心。

1 拐角处遇到爱：邂逅华夏传播研究

2006年当我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毕业时，同处人文学院的新闻传播系正处于升格为学院的重要时期。时任新闻传播系主任黄星民老师从学院未来发展全盘考虑，计划从哲学与历史两个专业引进老师，以便将来能够从史论两个方向来加强厦门大学具有光荣传统的华夏传播研究领域。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华夏传播研究是厦门大学的传统优势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处于执中国传播学研究牛耳的地位，至少在当时带动了全国的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尤其是华夏传播研究。但是到了21世纪初，除了黄星民教授等个别学者还在苦心经营之外，华夏传播研究逐渐淡出了学界的主流视域，以至于余也鲁先生晚年曾感叹道：

传播学现在成了一个多头或者无头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带头了，现在都是各说各的。有的拿到地理也讲一番，有的拿到历史也讲一番，你看不出他到底想讲什么，想研究什么。现在这些大学里面，好像厦门大学是搞广告，它把注意完全放到广告上。广告只是传播的一小部分嘛，是技术。我帮厦大建立了一个研究所，那个研究所应该做“中国传”的，他们把“中国传”列为三大目标之一。结果另外两个目标都搞得很好，就这个目标没有人搞，很可惜啊，很可惜。记得有一位教授写过一本《华夏传播论》，如果沿着那个路子走下去，现在肯定很有成就。传播学研究应该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主导的人，能够把现在有的东西整理一下。现在没有看见有个中心的领导在哪里，有一个机构或者哪个大学来牵头。

冥冥中似乎有天意。黄星民老师退休以后，除

我以外，当时几乎没有同事愿意专门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接手了他的这个研究方向。现在看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未来来看，都是有必要加强学科交流的。适当引进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的人才，对于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和人类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还是大有裨益的。厦大新传学院接纳了我这位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给了我舞台和表现的机会，这也是我对新传院心怀感恩的地方。既然学院相信我，那我就必须全心全意从事教学与科研，绝不拖学院的后腿，以报答学院领导与教授委员会的知遇之恩，我也立志担负起弥补余先生生前遗憾的重任。

初来乍到，我要上什么课呢？学院从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方面建议我在过渡时期，可以发挥自己专长，开设“传统文化概论”课程；另一方面可以开设具有浓厚哲学意蕴的课程，如“批判学派的传播思想研究”等。此外，还得慢慢接手新闻传播专业的基础课程，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我按照前辈们的指导，积极地备课，讲课，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买来许多新闻传播的经典著作，边学习，边研究，边写作。我还订阅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这四大刊。当时我的同事许清茂教授，看到我在去漳州校区的车船上还拿着订阅的刊物时，对我深情地说，“看来你是认真地融入新闻传播专业，为你高兴！”前辈同事的鼓励如同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跨专业学习并不容易，当时也有同事对我能否转型成功，持不乐观的看法。但我相信“我能，我行！”别人完成新闻传播专业本硕博的学习需要10年的积累，我相信通过自学，也能用10年时间完成专业的学习。我采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前辈学习，多请教少走弯路。当时经常向黄星民老师、许清茂老师、陈熾如老师请教，有时也去听他们的课，当然更多的是看他们的书。二是我考虑自己没有新闻传播学科方面的学脉，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科对接。恰好那个时期赶上学校允许在职做博士后研究，而且我院德高望重的陈培爱教授在人文学院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专门史方向下设有传播史方向的博士后，于是我主动向陈教授表达了想法，没想到陈教授并不嫌弃我没有新闻传播方面的专业基础，而是愉快地接纳了我，

并且同意我做“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方向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我是科技哲学出身，在写博士论文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加之我的硕士导师郭金彬教授正在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我的研究方向恰好既能从传播史的角度进入，又可以兼顾专业背景，于是我就埋头苦干起来。一面做博士后研究，一面从事教学。

感恩博士后三年学习！陈培爱老师给我提供了许多成长的机会，更是我的学术引路人。我在新闻传播学科的第一本著作——《中国视域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便是在他的帮助下纳入“厦门大学广告与传播艺术丛书”并出版的，该书的出版极大地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该书出版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有位同行说，他看过这本书，印象深刻。该书分“华夏传播研究”“科学传播研究”“广告传播研究”“传媒与社会研究”“新闻传播研究”“影视传播研究”等6个栏目，记录了我早期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记录了我带着硕士研究生从事研究的历程，从中我最大的研究心得就是：发挥优势，促进自己学术背景与传播学的交叉融合，是跨科学学者的必由之路。

（1）道家思想开启我的华夏传播研究之路。刚进入新闻传播领域时，对于华夏传播研究的认知是初浅的。我当时的本能反应就是从自己的博士专业出发，从可以与传播学对话的方面进入，这个便是语言。传播学者德弗勒曾指出，理解语言原理是传播学的核心。当时我阅读了武汉大学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论》一书，其书深刻指出：“道家在中国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传播活动中的‘真’‘善’‘美’概念，并且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弥足珍贵的。”受此启发，我撰写了《道家语言传播的真善美向度》一文，全文近两万字，我按真、善、美三个部分将之分成三篇独立论文，遂有了《道家语言传播效果的求美旨趣》（此文曾获厦门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道家语言传播过程的艺术神韵》《道家语言传播主体的求真意向》一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这组文章后来收录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的“名校·名师·名课”通识系列教材中的《中国道家之精神》一书中，该书是我与我的博士生导师詹石窗教授合作撰写的，已成为道家研究的重要入门读物。

这次成功的写作与发表给我的启示就是可以写出系列文章，就是说当确定要写某个主题时，那就

全心全意投入，力求竭泽而渔。具体说来，就是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充分理解与把握前人研究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研究思路，力求做到综合创新。而就选题的源起而言，就要多读书，书中往往有许多明示和暗示。明示的选题如李敬一老师指出道家的语言传播特色，只不过他没有深入去阐发，我们就可以接着研究；而暗示就是说，在有些书中作者会说某个方面薄弱，或者说值得研究，那往往都是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的方向。对于刚刚从事研究的青年学者而言，从这两方面入手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后我带领团队在老子（道家）的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方面继续拓展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成果。比如《道家语言传播意象之美的哲学玄思与现实观照》《老子非言语传播思想的内涵、功能及其当代启示》《老子不言不辩思想与春秋时期传播环境研究——与雅典“尚辩”传统的比较视角》等。可见，学术研究只要用功，同一主题可以从不同视角写出不一样的文章。

（2）广告启发我从事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研究。2007年，我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习。当时新传院有一个好传统，广告、新闻学、传播学三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可以自由选择导师。这个优良传统也使我得与各专业的研究生相互学习，教学相长。而且我自己也努力结合各专业方向来撰写学术论文，以此来促使自己更快地融入新闻传播学科。当时，我需要到漳州校区给一年级的本科生上“新闻学概论”，需要坐轮渡出海，我看到建设银行门口有个巨幅广告：“善建者行”（寓意“善者建行”），下面还标明这句广告语得以产生的出处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道德经》”

作为《道德经》的忠实爱好者，这则广告自然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就下决心写一篇以这则广告为例来谈广告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文章。接着来，我买了一本《现代广告与传统文化》，也查阅了中国知网上有关的文章，于是有了《论广告的深度创意与传统文化》一文。从这个事例我也意识到广告其实可以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于是我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撰写了《现代广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一文。这两篇文章的面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其实论文的选题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做生活的有心人，努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解释和分析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既

是彰显专业的路径，也是提升自我的方法。

（3）专业背景依然是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重要优势。我的博士专业是科技哲学，主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攻道家科技思想。这个专业让我既有科技哲学的教育背景，又有中国哲学的专业基础。在转向传播学研究的起步阶段，我尽可能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实现传播学与科技的交融，于是就有了科技传播的转向。在博后研究阶段，我把研究的时段限定在中国近代，于是产生了博后的研究题目“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

在读博期间，郭金彬教授给我们开设经典研读的课程，他带领我们研读科恩的《科学中的革命》一书，指导我们该如何读书，如何从中提出问题，并成为选题来源。郭老师的方法很有效。他先后指导博士生撰写并发表了数十篇研读此书而形成的论文，而且大多发表于核心期刊。郭老师还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日常读书时，遇到有用的材料就会摘录下来，尤其是会及时将因此而激起的灵感（选题）记录在本子上，这样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本本选题集，待到观点成熟时，一篇篇文章的构想就出来了。这个方法也为我和我的学生借鉴并不断传承下去。

我工作后还经常到郭老师家坐坐，谈谈学问，聊聊人生，每每都有感悟。记得有一天，他说起科学创意的传播问题，他凭着自己丰富的研究经验，指出科学发现和发明往往是从创意开始的，而创意既有可能在传播中生成，也有可能遭遇阻碍，同时科学创意也不是越早传播越好，需要考察具体的情境。他勉励我可以研究一下相关的问题。于是，我就动手研究，结合早年研读《科学中的革命》等著作所奠定的基础，先后写出了《科恩的科学传播模式及其效果检验方法》《科学革命与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传播》《科学创意的传播》等文章。这个经历告诉我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辛勤耕耘，终会有收获。另外一个感悟是，持续写作提升了自己的领悟能力，对于研究来说，写作是一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三年博士后研究给我带来几个方面的收获：其一，出站报告一部分随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即《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此书后来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其二，博后在站期间，我先后拿到了博士后一般面上资助和博士后特殊资助，这两笔科研经费对我如久旱逢甘霖，使我得以有充足经费

开展科研活动；其三，我把博后出站报告中因篇幅原因不能纳入出版的章节与硕士期间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研究》一书。当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恢复办学，正在大力资助图书出版。在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副院长陈支平教授的关照下，此书得到资助并顺利出版。回顾这段经历，我觉得善于把握机遇固然重要，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感恩。我感恩我所遇到的人与事，他们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正是他们如同垫脚石般的帮助，助我在学术道路上攀上一座又一座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的科技哲学教育背景为我走进媒介技术研究领域、进而深入探讨华夏媒介变迁及其与西方媒介环境学派的对话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这方面，我们的团队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如《尼尔·波兹曼论媒介技术演进与社会话语变迁》《老子的媒介技术观辨析》等。在下一阶段，我会着力这方面的耕耘，以因应媒介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研究日趋成为学术前沿这一事实。

（4）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开拓“老子传播学”研究新领域，奠定华夏传播研究的基础。前文已言，我工作之初便进行了道家语言传播研究，而语言显然是一种符号，于是我借助符号学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显学之势，2009年以“道家的符号传播思想研究”为题成功申报了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这是我的第一个华夏传播研究课题。这次申报成功极大地提振了我的学术热情与信心。于是，我决心一股作气开创“老子传播学”研究新领域，并不断建构新时代的教学科研模式。当时我的构想是，既然传播学通常以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为基本架构，那么，我就努力分别在这五个方向各写出一本书来，力争通过写论文、写专著来促使自己尽快熟悉传播学的基本知识。说干就干，干就干好。我在老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方向上不断推出新成果。第一本书是《和老子学传播——老子的沟通智慧》。该书是我开设“老子传播思想研究”院选课的结晶。课上，我引导学生从语言传播、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具象传播、信息传播、公共关系、传播模式、传播过程以及老子与彼得斯的思想对话角度探讨《道德经》与传播学的对话，并指导硕士生赵湘红完成了

“老子传播思想纲领”论文，然后我在此基础上编撰成书。此书作为省课题的结项成果，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老子传播思想的著作，引发学界关注，成为后来研究老子传播思想的必读书。一些学者专门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我，希望我能签赠该书。其中就有海南大学的毕研韬教授，他跟我说，他想带上这本书，到海外讲学。可见此书是较有特色和影响的一部作品。

我从1994年11月起追随知名民间学者黄友敬先生学习《道德经》，后来我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决定开设《道德经》校选课。这门课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厦门大学校级核心通识课程和福建省精品线上课程。与此同时，我坚持在《道德经》与传播学之间开展对话，努力建构“老子传播学”这一打通老学与传播学的新研究领域。具体过程如下：当第一本《和老子学传播》面世后，我就开始构思“老子的组织传播智慧”“老子的健康传播智慧”这两本书稿的撰写。之所以考虑先出这两本，是因为我当时觉得组织传播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也为将来准备上“组织传播概论”课程提前备课，而健康传播研究在当时很热门。此外，还是想发挥自己在老学研究方面的知识积累。不过，最直接的动因是导师詹石窗教授正受托组织一套丛书。当我把自己准备出系列老学书籍的想法告诉他时，詹教授欣然同意并协调把这两本著作纳入出版计划。

经过两个半年的努力，《和老子学养生——老子的健康传播智慧》《和老子学管理——老子的组织传播智慧》接踵面世。值得一提的是，应著名组织传播学者胡河宁的邀请，我参加了他在《今传媒》上开设的组织传播专栏，后一本书的序论后来便以《老子的组织传播思想纲领初探》为题刊载于该刊2011年第3期上（我后来还组织了“老子的人际传播思想”“传播论：老子的传播思想”两本书稿，因合作方工作严重滞后，导致此二书至今未能及时面世）。

为了探讨老子的内向传播智慧，我尝试以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作为参照，来观照中国的内向传播观念。凭借对《道德经》的熟悉，我直接就想到《道德经》第20章有“我”与“客人”的鲜明对比，可以运用内向传播理论加以分析，于是撰写了《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一文。由此，我开始了8年的探讨华夏内向传播理论的求索

之路，先后撰写了《道家内向传播的观念、路径及其目标》等近10篇涉及儒释道内向传播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结集为《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被荣幸地纳入第7批《厦门大学南强丛书》，将于2019年年内出版。

在老子人际传播智慧方面，我带领团队撰写出《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的人际印象思想考析》一文。在研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现译为《对空言说》）时，我感到老子的传播思想与之也有可对话之处，于是带领研究生继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加以探索，便有了《老子对人际传播现象的独特思考——与〈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比较的视角》《架构“交流的无奈”通向“人际的和谐”桥梁——论老子人际沟通的逆向思维》等文章。

受孔子后人孔健《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一书的启发，我想既然孔健先生写了本“阳光下的孔子”，我作为老子的“学生”，那也应该写本“大道上的老子”，于是我带领我的研究团队，从宣传学、符号学、修辞学、说服学、舆论学、政治传播、媒介批评、战略传播、性别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传播艺术、传播效果等多角度，相对系统地阐发了《道德经》所蕴藏的大众传播智慧，推出了《大道上的老子：〈道德经〉与大众传播学》一书及《老子思想中的媒介拟态环境批判意识及其治理之道》《人类交流的无奈与超越——对“道可道，非常道”的再思考》《“反者，道之动”：老子的受众观念系统考察》等论文。

由于“老子的人际传播智慧”图书未能及时出版，我不再等待，继续深入开展“老子的人际沟通”研究。我与研究团队基于《道德经》文本，结合自身的人际交往体悟，逐章剖析书中所蕴涵着的人际沟通启示，于是便有了《生活中的老子：〈道德经〉与人际沟通》一书（《和老子一起思考》《新老学与老子的初心》《道德经大众读本》等作品也即将面世）。

为推进全国的老学研究及传播事业，我联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业师詹石窗教授共同发起成立“华夏老学会”，并与江西宜春的崇道宫紧密合作，共同打造道德经文化传播基地。目前我们通过创办《中华老学》集刊（2019年已创刊），组织《中华老学丛书》，主办“《道德经》文化及应用博士学位论坛”等工作，努力将《道德经》文化发扬光大，造福世界，造福全人类。

2 明月几时有：海峡传播研究助我上青天

2007年6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宣告成立，厦大的新闻传播学院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厦门大学敦聘张铭清同志为院长，张院长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早期的研究生，又在海协会工作过，精通两岸关系与传媒交流。他执掌学院时期，将两岸传媒交流研究作为学院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而且很快地，2008年张院长牵头拿到了福建省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以及国家社科重点委托项目，这三个项目都是涉台项目。项目争取下来了，那就需要举全院之力来完成。当时暂属“青椒”的我也被征召入研究团队，由此也开启了我的“海峡传播研究”新领域。

我最早介入的是有关福建如何在两岸交流中起先锋作用的省社科项目。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中，我承担了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专题、对台宣传的困境与出路、两岸新闻交流政策三个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我都不熟悉，但做学问不可能时时都能做自己喜欢的内容和方向，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也不得不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既然是非做不可的事，那就必须调整心态，迎难而上。于是我就边学习，边研究。当时的一个信念就是，学问都是相通的，不懂就从头学起，就当攻克一个个难题。

现在看来，我非常感恩参与了这些项目，表面看来似乎是所学非所用，浪费了时间，但从现实效果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后来我能够评上教授，也得益于这方面的成果（具体过程后续再慢慢道来）。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前后有十年的时间。我的感觉是付出都会有收获，付出是很值得的。

（1）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催生一组研究文章。在研究这个专题时，我充分发挥学习过经济学的学科背景，积极撰写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形成了《构建“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的历史渊源与深远意义》《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构建的基础与愿景》《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构建的现实需要与理性前瞻》《“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流变》《“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构建的基本原则探析》等多篇文章。这一组文章后来申报了福

建省社科优秀成果，获得了三等奖。

（2）对台宣传研究专题结出硕果。说实话，对台宣传研究大多是涉台的相关政府部门或媒体人撰写的文章，尚缺乏专业性的理论著作。虽然早在上个世纪，我国已出现许多从国外译进的宣传学著作和国内陈力丹、李良荣等前辈学者的相关著作，但对台宣传学方面的著作仍鲜见。于是，我在相对摸清了涉台宣传研究的现状后，果断提出建设“对台宣传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并一股脑儿地投入这个课题的研究之中。我买了许多宣传学和涉台研究的资料，包括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资料以及涉台宣传政策的文献汇编，并按照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法、传播效果等这一思路，一下子就写出15万多字的研究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后来并没有被收录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项成果中，但我相信努力不会白费。两年后转机来临。当时福建省宣传部与厦大新传院合作共建，我借机申报了对台宣传方法与实践优化策略方面的课题，并幸运获批。我对之前的研究报告进行深化拓展并形成了一批成果，如《对台宣传受众定位的七大策略》《对台宣传的研究回顾、概念辨析与学科建构展望》《〈两岸传媒〉：两岸共同媒介的鲜活样本》《海峡两岸新闻交流政策的困境与出路展望》，等等。后来，我依托这些前期成果，申报了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先后两次获得立项）、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以及厦门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等一批相关项目，进而带领团队产出了《“解严”后政党角力下台湾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台湾地区新闻自由的困境及其救赎之道》《两岸智库媒体的营造与集群效应》《两岸政治互信中的传媒角色、功能及前景》（以该文为重要内容的课题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等一批论文。这些课题和前期成果助我于2014年顺利评上教授，并获批博士生导师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我为完成教育部课题而努力撰写的《两岸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身份认同及其交往逻辑的功能考量》很快就成为我申报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重要论证材料（于2015年获批）。随着国家级项目研究的推进，研究团队也获得了一些成果，如《文化认同视域下两岸数字公共领域的功能与观念前瞻》《以侨为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网络》《两岸数字公共领域下的文化认同探

究《台湾选举文化与媒体生态下的竞选文宣研究》。这一系列的项目与成果极大地激励我继续前行,也意味着我由哲学向新闻传播学的转型是卓有成效的(当然我将永远在路上,过往的成绩不过是我的学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对台宣传新闻交流政策研究,促发我的历史研究功夫。我是历史学博士后,做的是传播史方向。因此,多多少少有一些历史研究的功夫。当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安排我们研究台湾的两岸新闻交流政策和大陆的两岸新闻交流政策两个部分。我承担了大陆这一部分。这部分自然是要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岸从孤立到接触再到全面交流过程中的新闻宣传和新闻传媒交流,我带领团队系统梳理资料,形成了几万字的研究报告,并发表了《老子传播思想视阈下的两岸文化交流研究》《海峡两岸新闻交流政策的困境与出路展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两岸新闻交流政策诠释》《台湾三大报两岸议题话语框架比较研究——以“大一中框架”报道为例》等一系列成果。

在从事海峡传播研究的10年间,我从开始的不自觉到后来主动地立足地缘优势,积极开展两岸传媒交流合作研究,并因此也常赴台湾交流,从而更多地了解了台湾的传媒教育,也结交了许多台湾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伴随学术研究的收获。近年来,我借助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数字公共领域与文化认同研究”之机,提出了“两岸数字公共领域”的新概念,也提出建构“对台宣传学”的构想,深化了“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系统阐述了“建构两岸传媒特区”的构想,带领团队系统研究了“台湾新闻自由”观念的变迁,发表了一批论文,主编《两岸关系与海峡传播研究文库》,还

结集出版了《两岸关系与新闻宣传研究》《台湾新闻观念变迁与两岸传媒交流前瞻》《新媒体与两岸社会》等一系列著作。

在从事海峡传播研究的时候,我逐渐将两岸传媒研究扩大为两岸文化交流,从而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华夏传播研究领域,比如我用老子思想分析两岸文化交流的原则,探讨闽南文化圈在两岸统一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妈祖信仰在夯实两岸民意基础方面的作用等)。我们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也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发表了《妈祖文化中的道家元素与民俗传播的社会功能》《论妈祖女神符号传播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的积极作用》《妈祖文化:两岸情感沟通的媒介》等论文,获批“福建文化记忆的重构与传播话语建构研究”省级课题,联合全省同仁主编了《海峡传播与闽台文化记忆》一书。

3 小结

我过去十余年的研究经历告诉我,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诚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我的人生信条。这个信条激励我朝着自己的奋斗目标,勇敢向前,胜利终究属于奋斗者!

过去的十余年,尤其是近五年来,我还着力在华夏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方面下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下的华夏传播学已经走上了有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必将成为中国传播学大家庭中富有生机活力、蓬勃向上的一员。有关个人在这方面的奋斗历程,请看下篇分解!

The Constructive History of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y System (Part I)

XIE Qing-gu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361005)

Abstract: In 2006, the author began to work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Xiamen University, which started the academic path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the school and his personal innovation. In the past 13 years,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 gave full play to hi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opened up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Laozi, on the other hand,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the school, he broke into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mainland and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process, he tried to integrate the two into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Huaxia, thus creating a path of his own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 Huax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uaxia Communication; Laozi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tudy on mainland and Taiwan Strait



谢清果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谢清果，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华夏文明传播研究团队”负责人，担任《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等集刊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等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华夏传播学引论》《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等著作26部，主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华夏传播学文丛》等多套丛书，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60余篇。主持厦门大学核心通识课程“华夏文明传播”和中国大学MOOC“华夏传播学引论”，致力于建构华夏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